

从“嵌入”到“互嵌”：民族地区教育 对口支援范式的转型^{*}

袁 梅

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是党和国家为推动教育公平与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在进一步完善差别化的区域支持政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时代背景下，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范式由“嵌入型”转变为“互嵌型”成为必然趋势：“互嵌互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互嵌共建”是“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条件；“互嵌共享”是实现“高质量共同发展”的重要前提。构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范式，需基于“政府定位”“市场生发”“文化互动”的三重逻辑，通过搭建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信息塔”，拓宽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空间域”，激发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动力源”，促进民族地区教育治理的高效优质整合。

关键词：民族地区 教育对口支援政策 “互嵌”范式 内生动力

作者袁梅，女，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 100081。

1979年，在全国边防工作会议上，中央政府确定了东部省市对口支持民族八省区的决议，标志着“教育对口支援”正式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政策予以贯彻实施。^① 纵观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政策的演进历程，教育问题与民族地区其他问题，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交织错节，政策的内容、项目极其纷繁复杂，且受不同时期政策环境及价值取向的影响，处在不断变化发展之中，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有学者指出，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经历了“兜底性”发展、“追赶式”发展、“跨越式”发展、“内生型”发展四个阶段；^②也有学者从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政策的成熟与完善角度出发，将其分为萌芽期、成长期、成熟期三个阶段。^③ 尽管这些阶段划分是否精准有待进一步商榷，但是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政策本身反映了党和国家大力发展民族教育的信心和决心，带有极强的价值导向，政策的演进特征体现为伴随着政策工具和政策属性进行动态调整。

第一，政策工具由“强制工具”向“内生驱动”转变。政策工具分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

^{*} 本文系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时代民族中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20VSZ1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中国民族报》2021年5月21日。

② 李祥：《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政策七十年回顾与展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③ 代小菊：《民族贫困地区教育对口支援政策研究》，《中国成人教育》2010年第12期。

混合性工具。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民族地区以“老、少、边、穷”为特征,只能依靠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权威力量作为工具(强制性工具),弥补由历史地理环境造成的差距。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发达地区差距的缩小,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的政策工具明显出现了三种价值取向:其一,在“简政放权”理念下,政府的职能定位朝“服务型”发展。其二,在促进“共同富裕”理念的驱动下,国家的扶持发展、多种社会力量融合、交互发展,使得“自愿性工具”逐渐成为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政策优化的新方向。在共同富裕目标的引导下,多种社会力量也自愿加入了对口支援的行列,一些龙头企业纷纷设立了“共同富裕”项目,如腾讯先后投入 1000 亿元,启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战略”和“共同富裕专项计划”。^① 这些项目均包含教育支援的内容,为民族地区各级各类学校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多元的教育服务。其三,秉承“标”在发展,“本”在民生的理念,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的运行机制由“外援”向“内生”方向发展。例如,北京师范大学依托“师范教育协同提质计划”,“组团式”支持帮扶青海师范大学学科建设、平台搭建、专家引进、文化创设等各项工作,优化分批次交流学习机制,探索双赢合作模式。北京师范大学开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网络共享课程向两校全体师生开讲,引导青海师范大学学生参加高水平、高质量的课程学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往政策话语中的“选派”“抽调”“包干”等词汇逐渐被“激发”“内生”“互嵌”等关键词代替。可见,在国内新形势下,探讨强化民族地区教育的“内生力”,构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模式,成为民族地区教育治理的当务之急。

第二,政策属性由“区域援助”向“互利共赢”转变。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在我国对口支援系列政策中,实施时间最早、运行时间最长的是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故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较丰富。长期以来,学者们从经济学、政治学、民族学等学科视角对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产生了大量的理论成果。其中有些研究成果对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属性进行了极具学科特色 and 创新的界定,为边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属性的界定提供了多元化的视野。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归结如下:“从学术史角度看,经济学是较早关注对口支援系列政策并取得丰硕研究成果的学科”。^② 在经济学学科视角下,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被认为是一种“区域援助”政策,^③或者一种“财政转移支付”政策。^④ 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学科视角下,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被当做一种“政治性馈赠”,^⑤或者一种“府际合作”。^⑥ 概言之,诸多成果对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属性的界定,为我们回答“是属于何种性质的政策”这一基础问题提供了多维视角的答案。每一种代表性的答案都具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仔细审视发现,各种观点也存在其片面性:首先,不应仅仅从经济角度出发,将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看作一种物质性援助,而应看到“潜在的、隐性的”深层次帮扶,实施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不仅是提升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水平的渠道,更发挥着“稳民固边、富边固疆”的隐性作用;其次,在支援和受援地区的互动发展过程中,支援方输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是历史、地理等诸多原因所致,从这个角度说,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更应该理解为支援方

① 王小林:《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从贫困治理走向共同富裕》,《探索与争鸣》2022 年第 3 期。

② 丁忠毅:《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政策属性界定:反思与新探》,《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1 年第 1 期。

③ 杨明洪:《中央企业对口援藏的角色期待、角色冲突及其缓解》,《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1 年第 4 期。

④ 王玮:《中国能引入横向财政平衡机制吗?——兼论“对口支援”的改革》,《财贸研究》2010 年第 2 期。

⑤ 李瑞昌:《界定“中国特点的对口支援”:一种政治性馈赠解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 年第 4 期。

⑥ 林尚立:《重构府际关系与国家治理》,《探索与争鸣》2011 年第 1 期。

对受援方的一种反哺,而不仅仅是“馈赠”;再次,随着民族地区的开发与发展,也为发达地区支援方的资本投入、产业转移提供了机遇和平台,使得支援方和受援方的“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红利共享”成为可能。若将对口支援政策仅仅理解为单向度的“财政转移”“政治馈赠”,而对支援方和受援方的互动发展、互利共赢考虑不足,将不利于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也可能产生支援和受援的二元对立。

综上所述,无论是政策制定者还是专家学者,对民族地区对口支援政策属性的界定见仁见智,甚至彼此相悖。这些因视角不同而产生的对于对口支援政策的不同认知和评价实属正常,但这种以单向度的“嵌入”为主的视角存在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2022年9月,“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动员部署会”指出:“实施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坚持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推动各民族实现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推动中华民族成为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①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是促进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多维度互嵌”的重要渠道之一,教育对口支援作为横跨多重“社会域”的政策类型,其与促进各地区“多维度互嵌”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自洽。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政策导向已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兜底性”发展向“内生型”发展阶段转变。^②教育对口支援如何激发个人到社会的主体性,促进支援和受援各方在“志同道合”中互塑发展,亟需转变单方面“嵌入”的帮扶模式,从“帮扶”到“合作”,构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模式,这对于更加深层次地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快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嵌入”“互嵌”及“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意涵

“嵌入”(Embedded)一词,本是经济人类学实体主义的概念,最早由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其旨在阐释“经济体系嵌入社会关系”^③的内在逻辑。广义上是指一个事物(系统)深深地固定或伫立于另一事物(系统)的现象,揭示两者的密切联系,是一方能量作用于另一方,一方体系注入另一方的单向、不可逆、不可循环的关系。如今“嵌入”被赋予崭新内涵,广泛应用于传播学、金融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相关领域。在教育范畴,“‘嵌入型’教育对口支援”则意为在政府部门的统摄指导和统一管理下,通过“单向输血”的帮扶机制,将支援方教育体系中的成熟经验、成功做法顺畅植入受援方教育系统中,在单一化的帮扶流向中实现双方教育差距的缩小。经过四十余年的发展,“嵌入型”教育对口支援政策取得了良好成效,为新时代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模式转型与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基础:其一,加快了受援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夯实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经济基础。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截止202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4,838元,是其在国家援疆开局之年的2.41倍,^④在脱贫攻坚中,充分利用对口支援的各方的“协作互助”关系,解决了民族地区的“整体贫困”和“因贫辍学”等问题。2016年至2020年,新疆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出累计

① 《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动员部署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2-09/08/content_5708813.htm。

② 李祥:《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政策七十年回顾与展望》,《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

③ [匈]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第58页。

④ 《2021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http://htx.gov.cn/xinjiang/xjzfgzbg/202202/454f514c7f88470c9fb9e0683194fa7b.shtml。

3972.64 亿元,2020 年达 908 亿元,占比 16.96%,较 2016 年增长了 243.5 亿元,年均增幅 8.12%，“保基本”“补短板”“促公平”得到有效落实。^①其二，强化了边疆与内地的交流，打牢了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思想根基，诚如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的雪克来提·扎克尔指出的，新疆已是“治安最好、社会环境最安全、稳定形势最放心”的游客们赏心悦目之地。从 2016 年到 2021 年期间，援疆资金达到 941.07 亿元，各类援疆项目 10,757 项，^②在这一过程中，对口支援无疑起到了促进各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其三，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自 1984 年以来，国家在内地发达城市大力举办西藏班（校），目前，全国共有 21 个省市近 80 所中学开办西藏班或招收插班生，200 余所高校招收西藏班学生，形成了从初中、高中（中职）、大学到研究生培养的完整的办学体系。基于西藏班成功的经验，自 2000 年开始内地新疆班（含中职班）开办，二十多年来累计招生逾 15 万人，^③通过教育资源的共享，有效促进了民族地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然而，“嵌入型”教育对口支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援助依赖”的弊端，即由于国家长期对口支援政策，部分受援地出现了“等靠要”思想，缺乏自力更生的动力和能力，把发展寄托在外部帮助上，主要表现为财政依赖、资金依赖、人才依赖。因此，“嵌入型”教育对口支援已经无法适应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诉求，构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模式成为全面开创新时代对口支援工作新局面的突破点。2019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要顺应这种形势，出台有利于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政策举措和体制机制。”^④表明建立“互嵌”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成为新时代民族地区社会创新发展的重要内容。民族互嵌和民族地区的互嵌与传统所谓的“混居”有本质的差别，前者更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文化交流的多元性、情感的凝聚性与持久性等多层面特征。^⑤“互嵌”是相对“嵌入”而言的，“互嵌”（inter-embedding），指的是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或多事物）间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融合式勾连状态。意味着多主体间以最为合适、舒服的状态内嵌在一起，相互融合，交替能量；相互作用，共同成长，达成互嵌共生、共情、共赢之态，是一种双向流动、共通向上的圆活动态进程。

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内涵：一方面，是指支援地区与受援地区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对口支援”起到粘合剂的作用，使双方借助各自的教育资源，优势互补，整合教育发展的各个要素共同参与民族地区教育治理与发展，从而实现支援和受援双方效益、利益最大化。依据教育学观点，这些要素包括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包含各种教育资源）。另一方面，民族地区教育与文化密不可分，民族地区文化是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的基础，也是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

“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具有“集体意识、群体互动、认同互嵌”等特征，藉由“互融—共建—共享”这一生成性过程，使得区域性、离散性认同得以凝聚，从而形成一致的价值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社会基础并创造内生动力。第一，“互融”是实现“互嵌型”教育对口

① 《教育公平阳光洒天山南北》，光明网，<https://m.gmw.cn/baijia/2022-06/01/35779902.html>。

② 《2021 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网，<http://htx.gov.cn/xinjiang/xjzfgzbg/202202/454f514c7f88470c9fb9e0683194fa7b.shtml>。

③ 阳妙艳：《教育对口支援助力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中国民族教育》2021 年第 1 期。

④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伟大变革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铸牢》，《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1 日。

⑤ 张军：《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意义、特征及生成路径研究》，《烟台大学学报》2017 年第 6 期。

支援的先决条件。“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是党中央对“对口支援”政策与时俱进、不断调适的结果。在互嵌共融的民族关系中培育出族际交往的理性,增进彼此的共同性——这有助于培养不同民族身份的乡民之“家园”情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① 随着市场经济以及现代交通设施的发展,各民族地区群众跨区交流变得日益频繁,“每年城乡流动、跨区域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口大约有4000万”。^② 这种大规模流动,既是构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新模式的广泛社会背景,也是转固化“嵌入”为灵活“互嵌”,变单向输送为双向获益,化教育对口支援为全面长效合作的有利先决条件。第二,“共建”是实现“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重要环节。“互嵌共建”是改变以往“‘支援与受援’‘发达与落后’‘施惠与感恩’等单向度惯性思维”^③的破题关键所在。通过集合多方能量,营造一定的可以维持教育发展、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教育体系关联,在增强民族地区的内生发展动力的同时,推动支援地区教育体系的完善和教育质量的提升,在教育事业“共建”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中华儿女在经济、社会、心理、空间等方面的全方位“互嵌”,最终达成“有机团结”。第三,“共享”是实现“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提出“共享发展”理念,其中强调要推动义务教育共享发展。共享是共建的必然性归宿,只有高层级的共享才能引领高效率的共建,通过构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新机制,推动各族群众更好地“共享”教育改革成果,推动形成教育共同体关系,是践行“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实践基础,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举措。

二、“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民族地区教育 对口支援发展的必然趋势

“互嵌互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互嵌共建”是“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条件,“互嵌共享”是实现“高质量共同发展”的重要前提。从表面上看,“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是教育对口支援的一种新模式,而从深层次看,它却是教育对口支援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嵌入型”教育对口支援模式演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转向。

(一)“互嵌互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56个民族中的43个在全国各地均有分布,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有12个,有13个城市同时居住着56个民族。^④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为3.76亿人。^⑤ 民族地区人口的空间互动分布为各民族、各地区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新的条件和机会,历史和现实均证明,各民族、各地区“鸡犬相闻,互不往来”封闭状态并不是良好的社会状态,“一些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出现的彼此隔离、

① 徐燕、袁同凯:《河湟走廊上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临夏州唐汪人为例》,《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

② 沈桂萍、郝雨凡:《民族政策与中国边疆安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39页。

③ 欧阳康、熊翔宇:《新时代民族工作新思维引领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基于民族治理主体关系维度的考察》,《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④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民族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页。

⑤ 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国家统计局网, 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rkpcgb/qgrkpcgb/202106/t20210628_1818826.html。

互不接触的‘平行社会’状态,已经带来了民族关系脆弱、社会结构断裂的恶果”。^① 基于此,“嵌入型”教育对口支援模式通过人、财、物、信息等要素的交织、流动,让公众对此前没有进入的区域产生认同感与“有我感”,^②在提升中华儿女共通情感浓度上已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区域间文化兼容性的问题。在我国大开放、大融合的背景下,依托于“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政策的深入推进,推动各民族地区互嵌结构的优化,能不断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实根基,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

一方面,“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有利于促进支援地区和受援地区各民族“公共性”的生成。打造各民族共同参与的“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在政治、经济、文化、就业等诸多领域营造“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社会环境,^③为各民族良性互动、共谋发展提供机会,夯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旨在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精神共同体的构建。在尊重各民族差异的基础上,通过教育“互嵌”,促进各民族对彼此文化的包容和理解,形成教育领域“市场、空间、话语”的“公共场域”。例如,一位借助对口支援政策到内地读大学的学生自述,“高中毕业有幸地考到对口院校——华东师范大学,才让我的汉语水平突飞猛进。……在上海我也交了很多朋友,在与他们(她们)不知不觉的交往中,我越来越感觉到我能自由地说出我想说的东西,而且课堂上也不会引出笑话。我觉得学习语言还是要交往……”。^④“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就是打造各民族共同参与的教育实践空间,实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目标追求,打通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相互交流、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社会空间。

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先决条件看,各民族在居住空间上的“杂居分布”,文化上的“交融共生”,经济上的“互通有无”,社会上的“礼尚往来”,情感上的“彼此认同”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这些条件构成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重维度的整体性特征,其整体性特征客观上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走“互嵌与交融”之路。反言之,从“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中“教育”的功能来说,其三大功能(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蕴含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所有先决条件,发挥着优化民族地区,乃至国家社会结构的根本性作用。当前,我国社会也处在急剧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处在不断建构与重构之中,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应时提出“全方位嵌入”的指导方针。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应借助“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实现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教育资源、人力、技术等多重要素的科学配置,助推各民族社会和谐发展,形成人心归聚、精神相依的团结纽带,引导各族群众自觉投身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

(二)“互嵌共建”是“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条件

回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历史,各民族在“融合共生”“互嵌共建”中形成了各民族文化上“兼容并包”、经济上“互通有无”、情感上“相互依存”的“凝聚”状态,这也是中华民族坚毅前行的不竭动力。四十余年来,“嵌入型”教育对口支援模式虽已通过积极引导民族地区学校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初步实现东、中、西部教育发展差距的缩小,但在社会急剧转

① 郝亚明:《西方群际接触理论研究及启示》,《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② 严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空间整合视角》,《西北民族研究》2021年第3期。

③ 陈纪:《各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条件探析》,《贵州民族研究》2021年第4期。

④ 资料来源:笔者于2017年10月2日的访谈内容。

型、社会结构不断变化的新时代,已不能满足区域优质均衡发展的社会需求。因此,未来我国民族地区的教育对口支援更要秉承“互嵌共建”的理念,通过统筹支援地区和受援地区教育内外部资源,为民族地区“互嵌共建”搭建平台。“互嵌共建”不仅是新时代教育对口支援的基本理念和主张,也是“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条件。

首先,“互嵌共建”为“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注入了多样化的教育(学习)资源。从民族地区教育整体发展看,虽取得了巨大进步,但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仍然不太适应。例如,在民族院校的专业设置和招生比例上,文史类专业设置远远超过理工类,文史类专业学生占民族院校学生总数的75%,而理工类仅仅占约25%。^①建构“开放融合”“互嵌共建”的教育对口支援体系,是解决教育资源区域偏差过大的重要条件之一。与以往点对点、校对校式的单一教育资源注入不同,“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是多种优质教育资源的全方位输入,诸如社会力量、科研团队、知名高校、企业等,使得教育资源类型多样化,教育供给均衡化,有利于为民族地区教育自主、特色、创新发展注入活力。

其次,“互嵌共建”为“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供了多元化的教育治理主体。“互嵌共建”强调和尊重支援和受援地区立足于本土特色和发展实际,充分发挥支援地区和受援地区各方教育主体的创造性,多元联动,形成“平等、合作、协同”的“教育治理共同体”,从而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政府虽然是“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主导力量,但已不是唯一主体,诸多内地发达地区的重点大学,东南沿海地区的行业、企业、智库等社会力量积极加入教育对口支援工程中,通过设立奖助学金、提供志愿服务、建立就业创业基地和赞助校园文化活动等形式对民族地区进行教育援助。例如,2012年成立的首都师范大学京疆学院,探索创新内地高校培训新疆少数民族人才的新机制和新模式,为新疆持续输送中小学少数民族骨干教师,提升了新疆教师的整体素质,助推新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储备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在此过程中,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需逐步过渡到“互嵌、互生”机制,教育对口支援实现了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单一”的师资援助到“人、机、料、法、环”等多种资源的援助,支援主体由“一对一”向“一对多”转变,并形成了“内地办学”与“组团支援”双向“互嵌”的多元模式,激发出了多元主体主动参与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的活力。

再次,“互嵌共建”具有“拉动整体”的效果,有助于推动“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动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涉及人才、文化、生态、制度等诸多要素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充分发挥系统的整体性效能,实现要素和整体环节的同步优质均衡。而“互嵌共建”正是立足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资源、民族语言文化资源等资源禀赋,通过支援地区与受援地区教育生态要素的“相互嵌入”,发挥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诸要素的多元联动效应。总言之,“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建构和完善“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模式是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条件。

(三)“互嵌共享”是实现“高质量共同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嵌入型”教育对口支援模式中,教育资源主要流向民族地区的受援方,利益天平亦在向受援方倾斜,一定程度上妨碍了高质量共发展的“同心圆”的协同绘就。而“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最突出的特征是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双向流动,实现教育资源的“互嵌共享”,是实现民族地区高质量共同发展的先决条件。

^① 万明钢:《构建融合开放的民族教育体系》,《光明日报》2015年5月24日。

“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优势在发达地区教育对口支援西藏的经验中可见一斑。虽然内地对西藏教育的支援时间较早,首批援藏教师进藏时间是1954年,开启了西藏的现代教育,但改革开放前后相当一段时间教育援藏重点不是基础教育,而是当地的师范学校和相关高校。例如,1987年,由上海、浙江、山东等地对口支援拉萨、日喀则等地的4所师范学校和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西藏农牧学院3所大学,^①此后,这些高校一直得到内地高水平大学的支持。对于教育援藏来说,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1994年,“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成为国家教育援藏的一项正式制度,并逐步加大了教育援助力度。^②然而,这种传统的援藏模式逐渐显露出了它的弊端:首先是分散零星、不成体系,援藏教师基本是顶岗上课,缺乏对受援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系统设计;其次,对教师来说,受援地学校及教师缺少与支援高校之间的互嵌共享的交流,无法在援助过程中促进受援地教师专业化成长。

为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政府利用内地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师资优势举办内地西藏班(校),如北京市投资1118万元修建了拉萨北京中学、江苏省投资2.4亿元修建了拉萨江苏中学,并派出了援藏教师和管理队伍,开创了“家门口的西藏班”的先例。至此,通过“内地西藏班”与“家门口的西藏班”实现了支援地与受援地师资、学生的双向流动“互嵌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局面,且成效显著,2021年高考,拉萨北京实验中学上线率100%,其中本科率93.28%,重本率58.99%;拉萨市北京中学上线率99%,其中本科率92%,重本率65%。^③

“互嵌共享”理念下的教育对口支援,是社会转型加剧背景下的民族地区实现“高质量共同发展”的重要前提。首先,“互嵌共享”是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共同发展”的价值导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促进了各区域之间的交流,使得民族地区固有的文化传统性和相对独立性被打破,出现了“本土”与“异地”、“传统”与“当代”、“边缘”与“中心”价值观念的碰撞,在这一大背景下,“互嵌共享”理念下的教育对口支援以培育资源共享为价值导向,担负着守护、传承本土文化以及与“异域”文化建构“话语共同体”的双重任务。其次,“互嵌共享”是民族地区拓展“高质量共同发展”资源空间之路径。在“互嵌共享”理念推动下,所产生的区域协调集聚效应,既提高了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也为民族地区教育的全面振兴开拓了新途径。我国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着办学条件薄弱,高层次人才匮乏与流失等问题,故要发挥中东部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的集聚优势,推动加快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建设。一方面,中东部地区学校要发挥集聚效应吸纳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本,加强支援和受援各方的互联互通,消除因“恶性竞争”给民族地区教育带来的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充分扩大和利用教育合作集聚所产生的“溢出”效应,辐射和带动民族地区教育全面整体发展,提升民族地区教育竞争力。再次,“互嵌共享”是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共同发展”的区域合作机制。“互嵌共享”理念下,建构政府、市场、学校、产业协同机制,打造教育高质量发展所必需的“人、机、料、法、环”等资源共享平台,形成民族地区教育与产业协同的新格局,无疑是实现民族地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总而言之,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必须立足于新发展阶段,秉承新发展理念,密切关注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调整以往单纯选派行政干部或教师支教式的“教育对口

① 靳薇:《西藏:援助与发展》,西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43—393页。

② 杨明洪:《中央企业对口援藏的角色期待、角色冲突及其缓解》,《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1年第4期。

③ 余洋洋:《让青春在雪域高原绽放光彩》,《拉萨日报》2022年5月5日。

支援”模式,实行“互嵌共享型”教育对口支援,秉承“全方位、多层次”促进共享的“支援”理念,既能“授之以鱼”,也能“授之以渔”,推动民族地区教育等各项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从“嵌入”到“互嵌”: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的转型逻辑

为了有效推动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范式由“嵌入型”转型升级为“互嵌型”,应从政府角色定位、市场生发机制、多元文化互动等层面,捋顺、优化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的转型逻辑,为探寻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更优方案提供积极牵引。

(一)政府定位:由“统一监管者”向“社会力量的引导者”转变

回顾对口支援政策的产生及其制度化过程,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本质源于中国共产党处理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等方面的价值理念体系,但该价值理念体系并没有提供一套清晰的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理论。不过,在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政策的长期践行过程中,各行各业的“对口支援”行动为教育对口支援提供了可借鉴的技术手段。尤其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有效推动了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制度的“沉淀”进程,并形塑、完善了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制度。基于此,可以说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是多样化制度的借鉴、各行各业对口支援的实践和有效制度的“融合”过程。也就是说,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并非完全来源于民族地区和东部发达地区的创新和经验,而是不断借鉴内地发达地区的成功政策,结合民族地区的实际,支援方和受援方经过政策实践,“沉淀”出的适合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制度体系。但在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制度践行与完善过程中,中央政府始终是政策发起者和核心推动者。新时代,伴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固边守边工作的推进,我国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继续在实践中扩展完善。

纵览对口支援制度的演进过程不难发现,在“嵌入型”教育对口支援模式中,政府扮演的是“统一监管者”的角色,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并非支援和受援双方自发实施的,而是由中央政府基于支援方和受援方教育发展水平及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等诸因素综合统筹决定的。中央政府通过高位推动的权威供给,为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提供了可持续运行的动力源,又为教育对口支援运作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化解提供了机制保障。然而,在政府统一监管的对口支援模式实施到一定阶段,支援地和受援地签署的“对口支援”协议演化为内地发达地区为了被动完成支援任务而开具的“任务清单”;民族地区教育自主发展的能力和自主性不高;福利性的教育援助较多且具有单向性,没有形成“双赢”模式;对口支援工作更倾向于政策执行,而不是教育领域的互动合作,明显呈现出一种以单赢为主的被动型模式。为保证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实效,支援视角由“嵌入”转为“互嵌”、支援形式由“单向帮扶”转为“互助共赢”已刻不容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关于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时,频频使用“相互”一词,如“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等,表明了党中央在各个领域(包含教育),通过“互嵌”促进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均衡发展的决心。因此,构建、推行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模式,需要政府及时从“统一监管者”向“社会力量的引导者”进行角色转变。受援方与支援方政府应同步规划两地的区域发展战略与教育事业规划,将教育对口支援与民族地区教育内生发展的逻辑结合起来,两方面齐头并进。这就要求消融支援和受援各方组织之间的界限,加强各方各级政府部门之间、各方各机构之间的协调联动,提升各方、各级政府在制度、人员、信息、物

资方面的组织协调能力,促进民族教育领域的“互嵌”。以深圳对口支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塔什库尔干县为例,深圳政府将就业、教育、人才作为援疆工作重点,根据南疆地区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基础、民族宗教等特点,积极探索了社会工作人才援疆机制,首创了“社会建设援疆”模式,于2011年3月成立了南疆地区第一家由政府主导、民间自主运营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即深圳市对口支援新疆社会工作站),^①通过政府定位的完美转型,巧妙融合了社会力量,亦精准弥补了民族地区的教育短板。

总而言之,在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制度践行与完善过程中,中国政府高度的组织能力为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动力,加之近年来各地区在探索“互嵌型”社会治理过程中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这些成功的经验为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证明了在政府统筹下,推动“互嵌型”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是新时代“对口支援”体制机制创新的可行路径。

(二)市场生发:由“单向输血”机制向“共赢共生”机制转变

市场是“隐形的手”,政府是“看得见的手”,^②二者联手协作,才能保证“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良性运转。依据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与经济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大多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教育资源短缺,而教育资源的短缺常常让经济和教育陷入一种发展怪圈:民族地区经济滞后——民族地区教育水平偏低——重教育或重经济——二者都滞后。我国共有96.7%面积的民族自治地方分布于西部地区,占西部地区总面积的86.5%。^③尽管国家一直重视民族地区教育,但由于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教育所需资源与当地经济发展不匹配时,出于现实利益考虑,很多地区因教育是“长线”,对教育的投入起不到立竿见影的效益而选择优先发展经济。当前,我国处在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阶段,市场经济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环境,为民族地区教育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因此,我们应转换视角,用新思维、新视野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寻找新的契机。

“嵌”与“互”的关系在前文概念部分已经阐释,不再赘述。若只“嵌”而不“互”,长此以往会导致“对口支援”的虚化。早期,民族地区“嵌入型”教育对口支援的主要形式为政府主导下校际之间的合作,而企业、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但随着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的演进,支援方和受援方开始动员校企合作,并鼓动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使得“跨域协作”势不可挡。教育能带来经济效益,是历史证明的,而市场具有的“自由性”能够为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的教育“互嵌”提供更多的“自主性”,使得支援和受援各方依据市场需求展开教育活动,且与经济效益挂钩。诚如有学者所言:“2010年以来新一轮援藏、援疆工作开始普遍运用市场机制,市场经济发达的支援省市在运用市场机制上更为突出。”^④利用市场机制逐步提高教育对口支援中的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不仅能为支援学校的发展创造机会,而且能形成支援方和受援方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进一步提升教育要素的配置效率,将“无偿援助”变为“合理回报”,对口支援省市既获得了政治荣誉,也增加了其教育经济效益,强化了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的共赢属性。例如,2012年7月,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博州分院挂牌,建立了湖北职业院校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

① 严云鹤:《对口支援中的社会工作参与》,《贵州民族研究》2022年第4期。

② 王浩:《少数民族地区政府与市场的相应关系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4年第5期。

③ 郝时远:《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页。

④ 张文礼:《科层制市场机制:对口支援机制的反思》,《西北师大学报》2017年第9期。

州职业学校对口支援与交流合作的平台。其以服务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经济社会发展为宗旨,吸收行业协会、企业、科研机构以及其他自愿参加的社会实体及合作组织,按照平等、互利、自愿的原则组成了职业教育集团,^①基本实现了引企入校、办校进企和产教结合,圆满达成了链接社会力量、创新共赢共生的支援实效。

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通过推行“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模式,为支援各方社会力量办学搭建桥梁和平台,促使这些来自全国“四面八方”的社会力量参与办学,推动由“单向输血”机制向“共赢共生”机制转变,是化解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之间对“蛋糕”分割的两难问题,增加民族地区教育供给的关键举措。

(三)文化互动:由“二元区隔”模式向“互通互赏”模式转变

在民族地区对口支援关系中,支援和受援各方对彼此文化的认同是促进民族地区与教育发展的重要维度。教育主体的文化认同是教育主体与他人、环境关系在交流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对自我文化认同的再建构过程,包含着主体自我的反思与批判。受语言、文化、地域等环境的影响,支援和受援各方的文化认同既存在共同性也存在差异性:其“共同性”体现在支援和受援各方教育主体中的个体“小我”要紧跟时代步伐,与我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步调一致,并产生共振;而支援和受援各方教育主体的“差异性”体现在区域与文化际遇差异导致的主体各方对新时代教育改革与创新的敏感程度与接受程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不言而喻,当前支援和受援各方文化互动上存在着城镇文化与乡土文化、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外显文化与内隐文化、工具性文化和人文性文化等“二元区隔”现象。但从长远看,在社会转型时期,亟需强化区域文化互动,跨越文化区隔,破除以往“嵌入型”教育对口支援中文化交往受阻、文化兼容过低的情况,推动教育对口支援由“二元区隔”模式向“互通互赏”模式转变,促使各主体自觉将“小我”融入社会、国家的“大我”,夯实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文化基因。

“一个领域研究深化的基本策略之一,就是研究视角的革新”,^②从文化学视角来看,聚焦于各区域间文化的互嵌,也是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行动逻辑之一,其最终目的在于促进支援和受援各方区域之间的良性互动、打造良好的区域合作关系,促进两地间的互通互赏。首先,中央及各级政府从顶层设计出发,将“文化软实力”列入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内容。以上海、广东“嵌入型”对口支援某地区为例,受援地在“科、教、文、卫”硬件方面得到显著改善,甚至在某些领域已具有国内领先的先进设备,但因受援地高素质人才匮乏,支援人才一旦离开,这些先进设备有可能“闲置”起来,面临人才“空心化”的风险。^③因此,在对口支援过程中,支援地与受援地应共同研制本土人才发展长期规划,着力培养本土人才的技术素养以及产品开发、自主创新的能力,盘活本土人才的存量,挖掘本土人才的潜力,切实提升受援地的文化软实力。其次,要采取“走出去”战略,加大文化互动方面的对口支援力度,增强受援地文化产业的“造血”功能,形成受援地的优秀“文化品牌”效应。例如,中国美术学院在对口支援西昌民族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时,积极创设了文化传习所、彝族博物馆、民族特色实习基地、非遗工坊等实践项目,^④以学校教育和社会实践综合教育协同增进了西南民族地区文化在

① 蒋夫尔:《跨省职教园区是如何建成的》,《中国教育报》2015年10月15日。

② 常永才:《从文化认同与涵化视角看民族团结教育研究的深化》,《民族教育研究》2010年第6期。

③ 张晨:《职业教育“东西部扶贫协作”中的问题与实践研究》,《教育发展研究》2018年第7期。

④ 李梅:《高校对口支援凉山艺术教育援建模式建构研究》,《美术教育研究》2021年第18期。

国内文化市场中的影响力,为实现中华文化互嵌、互通、互赏奠定基础。再次,采取“引进来”战略,吸引支援地文化企业来受援地兴建项目,将先进的科学技术及文化价值观念引入受援地,使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实现文化“互嵌”,增强文化认同。如2018年山东省济宁市援疆工作指挥部联合山东省图书馆、文广新局援助建设了英吉沙县国学书院,通过打造国学讲堂、国学书屋、礼乐展示室、茶艺展示室、琴棋书画展示室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学校日常教学中,^①在推动文化融合发展中涵养了共同体意识。

四、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行动方案

以往的民族地区“嵌入型”教育对口支援模式,强调以高投入、高产出的形式着重解决教育贫困问题,主要关注的是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物质”问题,重点凸显了支援的“资源性”,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支援的“教育性”。基于此,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后扶贫时代”,需从“供需结构”“功能模块”和“价值导向”三重维度来建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融合的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模式,实现从“硬”支援向“软”支援转变、从“物质”援助向“物质+制度+精神”层面深度耦合援助转变的目标。

(一)供需匹配:搭建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信息塔”

当前制约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范式转变的障碍之一是支援地与受援地二者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民族地区教育需求侧与“对口支援”供给侧的不匹配。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支援地着力建设对口支援数字服务平台,如2021年,浙江搭建了首个对口支援甘孜藏族自治州的数字管理服务平台,帮扶甘孜在平台建设、人才引进、场景应用等各方面进入快车道,动员和吸引各类社会资源参与进来,齐心协力推动“数字甘孜”建设开创新局面。^②为此,要推进支援方与受援方信息互通,需搭建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信息塔”。

首先,发挥信息的共享功能,准确研判需求。一方面,基于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现状和前景规划,制定并发布各级各类教育人才需求报告,并预测各级各类学校人才的需求走势,旨在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等各方面满足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诸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辅之持续性的实地调研,搭建实时性信息服务平台,共享民族地区教育需求的人才数据库,使教育对口支援各方做到精准把控与对接。当然,从调研对象上看,民族地区的教育需求调研涉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并非一所学校或几所学校就可以完成。从调研内容方面说,因民族地区教育涉及语言、文化、地域等诸多特殊性,在调研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人文性和伦理性,避免“数据”至上的误区。

其次,发挥信息的指导功能,实现产业对接。一是加大各级各类学校及其学科专业的建设力度,打造民族地区的优质学校及品牌专业;二是“三链同构”(即教育链、产业链、价值链),为民族地区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产业紧缺人才;三是充分利用支援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通过利用支教、科技文化传播等渠道,改变单一的支援模式;四是,发挥信息的反馈功能,调整支

^① 《文化润民心 援疆情更浓》,央广网, https://xj.cnr.cn/2014xjfw/2014xjfwws/20180801/t20180801_524318146.shtml。

^② 《浙江首个对口支援数字管理服务平台上线发布》,甘孜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网, <http://www.gzz.gov.cn/gzzrmzf/spbd/202110/5b2d4c7527be40c0a42e632d71e913a2.shtml>。

援任务。依据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不同阶段对人才素质更新和能力提升的新诉求,大力推进职后继续教育,支援院校与各类培训机构联手合作,对职后人员进行“追踪式”培训,对其进行思想道德、岗位技能、创新创业方面的培训,使其成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强大“生力军”。

(二)功能融合:拓宽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空间域”

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实际上是一种“跨域合作”,不仅关联着支援和受援各方区域发展的各个层面,更以对口支援与民族教育的复合功能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教育的复杂性(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关系)决定了“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全面性。“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重要职能在于以民族地区教育为抓手,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功能的“跨区融合”,拓宽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空间域”,助推民族地区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

首先,发挥“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经济功能,拓展民族地区教育的经济服务空间。“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通过整合与共享支援地和受援地的教育资源,提升教育对口支援的经济服务效能:一方面,要以人才转移和科技文化的传播与推广为主,强化民族地区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功能;另一方面,要通过支援与受援各地的联盟,促进教育发展所必需的“人、机、料、法、环”等要素向民族地区流动,使民族教育发展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创新”,实现“造血式”发展,激活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文化、生态等诸多要素融合。

其次,发挥“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社会功能,拓宽民族地区教育的社会服务空间。“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本质是支援地和受援地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其他社会机构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教育治理,借助多方力量整合支援与受援主体间的利益,形塑各民族、各地区“共同体意识”以推进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旨在实现从民族地区教育“小治理”到全社会层面“大治理”的升级,构建“优质均衡”“高质量发展”的民族地区教育治理环境,从而有效地将民族地区教育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和精神文化。

再次,发挥“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生态功能,拓宽民族地区教育的生态服务空间。“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带动了民族地区的教育现代化,丰富了广大民族地区群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但科学技术对民族地区教育赖以存在的生态环境的作用却往往被忽视。从这个意义上说,“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重在发挥教育供给与转化的作用,其不仅仅是教育资源的表层供给,更要体现其在推进构建“人与自然共同体”的意蕴深耕。“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在推动民族地区教育现代化的同时,应以涵养生态、保护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重要任务,通过支援与受援主体的协同,实现人才培养与输送、资源集聚与创新,推动民族地区自然生态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三)价值契合:激发民族地区“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的“动力源”

“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看似为教育资源帮扶抑或政策制度支持,但其深层次的价值引领不容忽视,“对口支援自一开始就带有某种伦理道德或者人类内心深处的某些信念”。^①因此,要激发“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内在的“动力源”,协调“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关系,深入推动民族地区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民族地区教育是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发展教育无疑能为民族地区未来发展获得机会。我国民族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边陲,民族地区教育也是西部大开发的主要内

^① 谭书先:《对口支援的政治认同构建》,《江海学刊》2020年第7期。

容之一,要始终要坚守“西部大开发”的本体价值,即要坚持以就业导向、扎根本土、服务民族地区的本土人才为目标,其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是提升民族地区人力资本水平。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民族地区人口融入其他省市的程度不断加深,也出现了多元化、多层次的利益需求,面临诸如“子女入学”“就业保障”“社会保险”等诸多困难。为此,一方面,通过“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政策的实施,提高民族地区“流出”人口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营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的教育环境,通过“相互帮扶”“结对子扶持”“减免学费”等方式,建立“交往交流交融”的体制与机制,促进价值认同,并形成反哺效应;另一方面,要以“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为契机,加大区内外合作,“不拘一格降人才”,吸引人才“流入”民族地区。同时,坚持支援方的教育精准供给与人文思想教化“双管齐下”的策略,激发“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对接民族地区教育的“动力源”。

五、结 语

新时代是各民族之间共同因素不断增加的时期,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做不到顺势而为。^① 民族互嵌是新时代党中央对民族地区工作的又一理论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本身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空间等诸多维度及其要素“互嵌”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通过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促进中华民族各维度的“互嵌”和整合,有利于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基础。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解决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成为今后民族地区教育对口支援的关键任务。为此,首先要借助“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改变单一的教育资源的“横向转移”模式,建构政府、市场、社会等政策要素“互嵌”发展的对口支援模式,从而提升政策主体与对象相互配合的适切性;其次,在政策性工具上,结合实际增加自愿性工具,社会力量的参与度以及民族地区群众的积极“互嵌”参与,即“提升民族教育政策的效应以增加各民族文化的自我生发能力”^②,才是民族教育内生发展的有效途径;再次,优化政策工具选择策略,建立以“互嵌”为特征的“混合型”教育对口支援政策工具,建构系统的政策运行机制。逐步完善“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模式,让“互嵌型”教育对口支援这只“隐形的手”发力,促进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发达地区先发优势有机整合与良性运转,促进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责任编辑 马 骏〕

① 严庆:《“互嵌”的机理与路径》,《民族论坛》2015年第11期。

② 蒋珍莲:《论民族教育政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协同生成》,《民族教育研究》2018年第4期。